

唐振常文集

【第一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阅 览

C52
201339
1

唐振常文集



【第一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振常文集/唐振常著;唐明,饶玲一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138-9

I. ①唐… II. ①唐… ②唐… ③饶…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326 号

唐振常文集(第一卷)

出品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销:新华书店

照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7.5

插页:4

字数:290 千字

版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38-9/C·053 定价:880.00 元(全七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在学术讨论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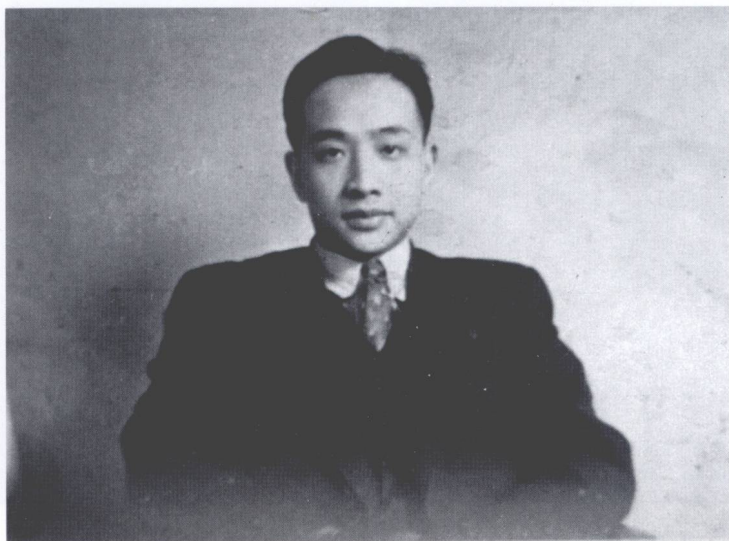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者摄于成都文庙后街住宅内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作者（左）与未婚妻陶慧华摄于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



一九四六年作者燕京大学文学士毕业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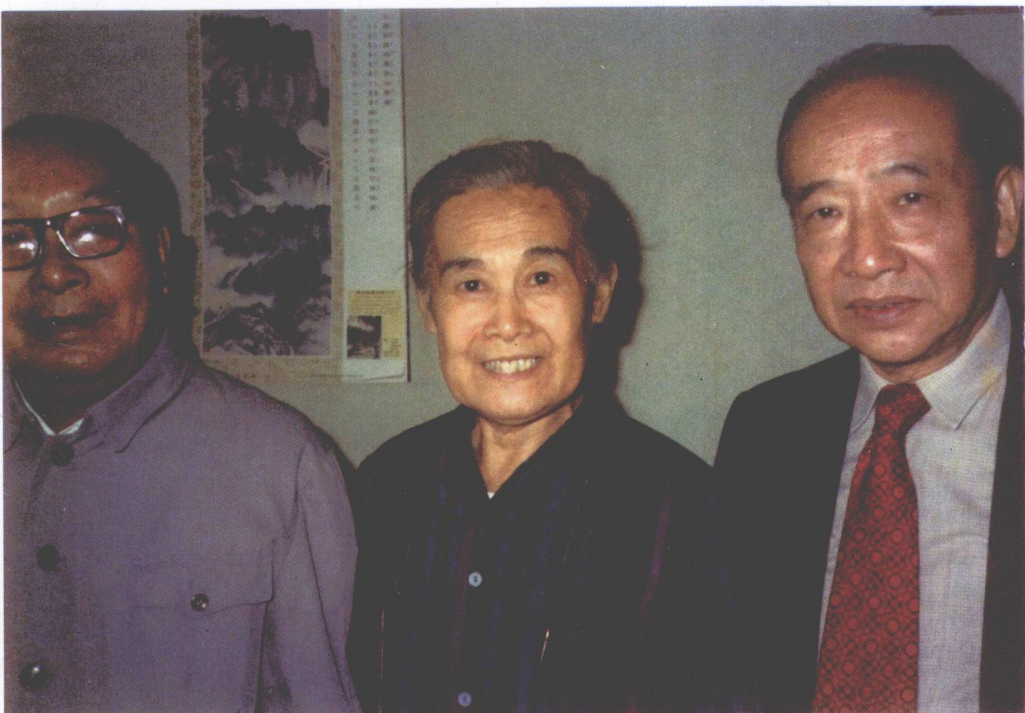
作者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



作者（前左）及其妻陶慧华（前右）与长子唐明（后中）女儿唐玲（后右）幼子唐元合影



作者（第三排左三）与上海大公报同事摄于一九四七年秋



作者（右）与历史学家黎澍（左）及黎妻徐滨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作者在徽商研讨会上



作者（左一）及其妻陶慧华（左二）与美国历史学家徐中约（右一）及徐妻摄于一九九七年七月



一九九二年作者（右）在美国探访母校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左）及夫人

编辑说明

本文集共分七卷，简述如下。

第一、二、三卷为识史卷，收入父亲（外祖父）所写历史论文、专著、谈史札记随笔等，之所以采取混合编法，目的是使相关文章归入一类，便于读者了解父亲（外祖父）对该问题的看法。至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既非论文又非随笔，是父亲（外祖父）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作导读，父亲（外祖父）极为尊师重道，易名为《学习笔记》，我们将此文置于卷首，父亲（外祖父）如在天国得知，当会首肯。

第四卷为怀人卷，收入父亲（外祖父）怀念其亲属、老师太老师、前辈、领导、友人、同学、同事等文章。不少人一业为主，兼及他业，我们以其本业或称主业分类，即历史、外国文学、中国文学、自然科学、戏剧、电影、新闻、政治各界。有一部分人，执本业或主业者仅其一人，即将他们归为一类，插入中国文学与自然科学界之间。

第五卷为文化卷（狭义的文化），分为上海文化（包括上海史）、中国文化、四川及常州文化、读书、抗战与文化、新闻、出版、香港文化、自叙（叙序同音同义，除父亲〔外祖父〕的几篇自序外，按叙含述义，掺入他的《流年大吉算军粮》，是对他一九九九年出书的叙述）等类。至于《赏珍》与《还书记》，想不出类别的名称，但毕竟与文化有关，也就插入“香港文化”与“自叙”之间，以备一格。

第六卷为饮食文化与记游卷。其中《柏克莱通讯》是父亲（外祖父）写他参加上海史讨论会的情况，归于识史卷或文化卷则嫌单薄或不宜，故与《小城柏克莱》等记游文章归为一类。

第七卷为电影戏剧及其他卷。电影，即父亲（外祖父）的电影文学剧本；戏剧，即他的戏剧评论及谈艺短文，其中父亲（外祖父）为《麒麟童生死

情缘》所作序言,《麒》书写的是周信芳与他妻子裘丽琳的故事,父亲(外祖父)作序,虽非谈艺,然与周信芳有关,故归入此类;其他,包括时论、随感、早年家庭与老师同学旧事回忆、毕业论文、自传、主要著作目录,并附唐明一篇小文。

一般编选文集,作者为他人之书所写序言,多单列一类,我们未取,而是根据序言内容,归入相关类别(《一代宗师生死劫——〈麒麟童生死情缘〉序》除外),目的同前所说,为使读者易于了解父亲(外祖父)对此相关类别问题的看法。恰当与否,读者鉴之。再,父亲(外祖父)写某篇文章引用某份材料阐述某个观点,后来写其他文章或因文章需要而引用同一材料或阐述或强调同一观点,在不同的时间看不同题目的文章或许不以为意,现在放在一部文集里即有重复之感。我们已尽量删除一些有重复文字的文章,但很难完全避免,敬请读者见谅。

父亲(外祖父)从青年时代发表文章,他从事新闻工作所写,大多与时事同成过去,因此我们选了少量文章,重点在父亲(外祖父)进入历史学界后他的代表性之作。但“代表性”并不表示观点完全正确,如写于“文革”方结束时的几篇文章,措词及用语,都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痕迹,今兹选入,一仍其旧,意在尊重历史。

对收入文集的文章,我们尽量在篇末注明写作时间或发表于报纸杂志的时间或期数,但也有个别文章无从查考,只能付诸阙如,亦请读者谅之。

唐 明 饶玲一
二〇一二年九月

序 言^①

熊月之

唐振常先生去世时，没有举行任何由单位出面组织的集体悼念会，连惯常的遗体告别仪式都没有，只是由少数亲属出面，搞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这是先生的遗愿。先生是喜欢热闹的人，却将自己的离去安排得那么冷寂。这是为什么？先生没有明确说过。我揣度，他将生死问题看得通透，不想打扰生者。他明白，学者的生命是与其学术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学术影响在，则学者生命在，焉用悼念！

先生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十年了。他永远地驻留在沪西福寿园内，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一个安恬静谧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地方。他的画像，表情生动，似在沉思，又似在演说。他在思什么、说什么呢？也许，通过这部文集，人们可以有所领悟。

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七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湖南衡阳，其祖父辈迁贵阳，再迁四川，遂为川人。祖父讳家驹，字直夫，光绪二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外放四川荣县知县，有政声。唐家亦由此成为成都大家族。唐家居成都南城文庙后街，四进大宅，高墙深院，大小房屋六十余间。先生父亲讳仲威，有兄弟三人，排行第二，清末纳资为候补道，未实授，中年以后长病无业，一九四六年到上海随子女居住，一九六一年去世。母亲龚

^① 唐振常先生去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悼念《史海寻渡—通才》，发表在《文汇报》上。本序言在其基础上，有所补充与修改。

氏,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能写一手好字,有才名,其父兄均为四川文化教育界名人。先生受母亲宠爱,受母亲影响远远超过父亲。

先生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塾师原是先生母亲的老师,学问极好,督责严厉,脾气暴躁,每因细故而痛殴学生。一次,先生因擅游公园,被发觉后,一顿痛打,乃至遍体鳞伤,在家躺了好些日子。一九三一年夏,先生十岁时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那所学校是一些复古人物办的,设在孔庙,所学内容是古书加上一些现代课程。先生在这里读了两年,小学毕业,本拟进成都县立中学,那是先生外祖父创办、先生很多亲戚都在里面当教师、做学生的,是成都最好的中学,其校长就是先生的舅舅。先生的母亲一心要先生考这所学校,先生也确实去考了,遗憾的是,没有考取。由此也可见这所学校录取学生何等严格,不讲情面!无奈之下,先生进入大成中学,继续学习。这是一所最有名的复古守旧学校,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校长徐子休,是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之一。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先生所习尽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内地成都,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先生日后回忆:“初小四年级的主要课程是《礼记》,到了高小,主要课程是《左传》。老师都是些踱方步、满嘴之乎者也的人物,整个学校死气沉沉,体罚是家常便饭。”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极枯燥,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其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于一九三五年春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管理严格,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英语,也能读到不少新文学书刊。一九三八年春初中毕业,先生进入成都私立蜀华中学读高中,一九三九年初转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光华附中是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学生大部分是外省逃难到内地的富家子弟,风气开通,比较自由。此时,先生已因父亲病、家道衰而渐渐理解人世的艰辛,懂得勤奋的重要,因此,谨遵母训,发奋读书。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中学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

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对于专业,先生因为此前读过不少文艺书,英文又好,想进入外国文学系,但是他的母亲主张他学农,先生于是报考了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一九四二年夏天。

燕京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办的学校,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原在北京,抗战爆发后迁入内地。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燕京新闻》,参加海燕剧团,担任团长,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名闻遐迩,几乎每次燕大学生宣言,均由先生执笔。先生曾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上发表小说、散文、译文、杂文多篇,结识了在那里工作的共产党人黎澍、陈白尘等,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和民主同盟,由此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一九四六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初任国际版助理编辑,后当外勤记者。一九四八年十月走香港,任《大公报》编辑。翌年六月回上海,任《大公报》采访主任、编辑,主写社论,兼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一度在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兼课,讲授《新闻采访通讯与写作》。一九五二年底随《大公报》迁天津,因不适应编辑方针的改变,加上夫妻两地分居,于一九五三年五月调回上海,进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先生在《大公报》首尾七年,由上海而香港而上海而天津,由编辑而记者而采访主任,涉及领域由国际而政治而文教而文艺,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锻炼了能力,走出去能采访,坐下来能作文,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那一阵子,热情高涨,精神抖擞,笔走龙蛇,文采焕然,每每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

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后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先生第一年受组织安排,在编辑室做行政工作,担任副主任,第二年开始做专职编剧,写过反映大学教授思想改造问题的剧本《日月光华》,将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其中关于体育题材的《球场风波》曾正式发表,并被

拍成电影,先生也为此被批判多年,理由是思想右倾。先生自一九四九年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努力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迟迟没能如愿。其中原因,我们从他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汇报”中可以看出端倪,一个是他的家庭出身,再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之类缺点。那时,先生像许多热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断地改造思想,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地追随时代的步伐,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先生自述,他在黎澍手下工作时,黎澍曾有意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过暗示,但先生大大咧咧,没有察觉。一九五七年一月,经王世桢、石方禹介绍,先生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八年以后,先生调《文汇报》工作,任文艺部主任,在那特殊的年代,以先生的个性,要想有所作为也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靠边站,曾在新闻出版干校劳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工作,牢骚腹诽不少,读书也不少。一九七八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九八〇年评为研究员。一九九三年退休。历任古代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历史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二〇〇〇年八月,先生因肺癌住院,二〇〇二年元月二十七日逝世,享年八十。

二

先生后半生的专业主要是历史。他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取精用弘,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苏联学者曾将其译为俄文,日本学者也有专文介绍。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的先锋。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

撰文写书,均努力于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那是他的太老师,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先生主张述史论人,要像法官断案那样,不带主观情感。台湾地区学者孙万国不赞成先生的意见,认为学者治史免不了会有感情因素,二人为此函件往来,各抒己见,讨论再三。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八十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撰写的《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租界论述》等论文,均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对租界的影响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上海史学界召开“租界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唐振常先生与陈旭麓先生是会议双主持,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对于租界双重影响论,予以坚决支持并详细阐述。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所到一九八六年才有《史林》,此前没有所刊,一些上海史文章通常发表在《上海史志研究通讯》上,那是一份有连续刊号的内部出版物,署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志研究会主办”。先生对通讯稿件,编辑、修改极为认真,我亲见他将来稿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先生是上海市地方志评审委员会委员,对于评审方志极为负责。我多次追随先生参加地方志

审稿工作。新修地方志有一通病,即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一笔带过,叫做“宜粗不宜细”,先生对此大不为然,一有机会,就要阐述重视研究那一段历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醒人们汲取历史教训。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先生晚年在人物研究方面下过很深功夫,除了论章太炎、蔡元培,说吴虞,还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黄远庸、张东荪等诸多历史名人作过研究,所论多大处落墨,高屋建瓴,卓识纷呈,能见人所未见。他曾多次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我国台湾地区讲学,特别是香港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几乎年必一至,或一年数至,所讲或为上海史,或为近代人物,或为隋唐历史。先生记性好,口才好,风度好,见解独到,所以,他的演讲总是那么受欢迎。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微观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抒情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意境越老越醇厚浓郁。其旧学功底既深,熟背经典,又当过报人,为文快捷,故其文章文白交错,绚丽多姿,既可以称之为典雅的白话文,也可以称之为浅白的文言文,既流畅,又耐读,成为一种独特的唐振常文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洪亮声音,看到唐振常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的《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川上集》、《饕餮集》、《俗轻集》、《澳洲见闻》。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三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妙的是,他能将饮食与文化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